

警服变迁：一段具象的法治发展史

□ 王鹰

前不久，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25式人民警察制式服装（以下简称“2025式警服”）正式列装。这是新时代以来，人民警察队伍首次整体换装。对于提升执法司法的严肃性、规范性，增强人民警察的职业荣誉感、归属感，展现新时代人民警察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历史，人民警察制式服装经历了9次较大的改革，分别是50式警服、55式警服、58式警服、66式警服、72式警服、83式警服、89式警服、99式警服、2025式警服。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具象化符号，警服的演变轨迹记录了社会的变迁，也诠释着法治精神与服饰美学的融合。这种服饰文化的演进，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视觉叙事。

从戎装到警服的分化路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公安干警身着与解放军相同的土黄色军装，左臂佩

戴“公安”字样盾形臂章。这种设计源于当时公安部队尚未完全脱离军队建制的历史背景，但“中国人民警察”白底红边胸章已初现警种标识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女警服采用列宁装设计，通过收腰剪裁体现性别特征，这种细节处理暗含了新中国对女性职业角色的重视。

1950年2月政务院批准的《公安部及其所属武装部队服装样式草案》，标志着中国警服制度正式建立。墨绿色棉衣（冬装）与米黄色单衣（夏装）的搭配，通过色彩传递出稳定感。这一时期警服采用铜质领章，右领“人民警察”字样与左领警种及编号（如“治”代表治安警）的组合，体现了“专业分工”的治理理念。军队专注于国防而警察重在维护社会秩序重建的分工逐渐清晰。

1955年换装的白色上衣与藏青色裤子组合，通常简称“上白下蓝”，突破了传统军警同色模式。这种设计借鉴了苏联民警制服元素，白色让人联想到“清清白白”的执法理念，而藏青色则给人理性与权威之感。女警无檐帽的引入，既考虑了女性头部轮

廓特点，又通过帽徽上的金色麦穗图案，呼应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警服取消了绑腿设计，改为西裤式样，反映了公安工作从战时状态向社会常态管理的转变。这一年正值军队大换装，首次实行军衔制。军服与警服的重大变革，标志着国家武装力量 and 警察力量进入了全面正规化时期。

58式警服在保持55式警服基本形制的基础上，取消了胸章，增加了领章。领章是红色斜型，上有盾形金属徽章，盾牌中间则是国旗式样的一大四小五颗五角星。

接轨国际的现代化探索

1983年换装的橄榄绿色警服，是警服的一次重大变化，标志着中国警服设计更重视色彩心理学。这种介于军绿与墨绿之间的色调，既保持了执法权威感，又通过明度提升增强了亲和力。83式女警服引入西服领设计，通过V领线条修饰颈部曲线，体

现了改革开放后对女性职业形象的重新定义。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人民警察衔制度建立。

1999年换装的藏蓝色警服，采用国际警服主流色调，通过色彩对比度研究确定最佳明度值。常服通过合体剪裁与收腰设计，塑造出挺拔的执法形象。值得注意的是，99式警服与警察工作场所标识及警车式样和标识有着视觉上的呼应效果，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警察执法全场景贯通。这一系列的设计，辨识度度高，震慑力强，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感。

赋能实战的科技化升级

据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在99式警服的基础上，2025式警服在样式、色调、标识等方面不作大的调整，主要在功能、品种、版型、面料等方面作出改进。

一是改进优化款式，如执勤服一线款上衣设计为“冲锋衣”款，执勤裤改进为“轻战术”款，更加注重提升执勤执法和训练实战效能。

二是调整完善品种，沿用99式警服的品种门类，减少不常用的5个品种，增加服务实战实训的7个品种，并根据不同部门警种、气候区域、勤务类型、工作场景等实行差异化配发。

三是应用新型材料，使用科技含量较高且价格合理的国产科技新材料，提高抗皱、透气、保暖等性能。

四是健全完善标准，充分考虑特警等警种轮训轮值、战训合一的工作特点，结合当前各地被装经费保障总体水平，制定相应配发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2025式警服虽然相比99式警服有了全方面的改进，但警服换发经费却较现行标准年需经费减少约2.36%。这是一系列措施带来的结果：所有警种均减少配发数量、延长使用年限；坚持向基层一线倾斜，机关民警调整降低标准；不一次性配发全部品种，在年度经费预算额度内，每年换发部分品种。这也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新旧款警服并行，直至全部品种逐年替代完毕。

警服演变印证了“服饰作为社会关系符号”的理论。从50式警服的军警同源设计，到2025式警服的全方位改进，反映了公安工作从军事化管理向法治化服务的转变。这种服饰文化的发展，也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魅力。当民警身着2025式警服出现在街头巷尾，他们穿着的不仅是一件制服，更是一个国家走向法治文明的标志。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图为电视剧《罚罪》海报。

当法治精神化作那束光——电视剧《罚罪2》观后

□ 邓跃东

“天就快亮了。”

刑警胡小跃的遗言掠过夜色笼罩的城市，随后他纵身一跃，用生命撕开了扫黑风暴的序幕。电视剧《罚罪2》开篇，这个镜头犹如一记重锤，震撼了万千观众的内心世界。在岁末的荧屏上，这部剧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追剧热潮，也发起了一场关于法治信仰的集体确认。

在扫黑题材并不鲜见的当下，这部电视剧凭什么击中人心？答案就藏在创作者与法治实践的血肉交融中。

《罚罪2》原著作者舒中民的特殊身份——既是刑事案件侦查的亲历者，又是作家——决定了这部作品的质地：它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法治一线淬炼出的晶体；它不是拼接在一起的第二素材，而是见证甚至承受的切身之痛。当影视改编以敬畏之心锚定“真实”二字，将阎灵堂开枪威胁证人、葬礼上铲车压扁警车、恶意切断全村电源逼村民卖地等情节原汁原味地搬上荧屏时，完成的不仅是一次题材的突破，更是法治精神从抽象条文到可见可感的形象化过程。

在《罚罪2》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能找到原型——用军事素养打造警营的叶天佑，取材于作者的一位领导；铁骨铮铮的保安丁铁军，源自作者在办案中结识的退役军人；核心角色秦枫的兄弟们，那些叫“疯子”或“麦子”的普通民警，都是与作者并肩作战的战友。从龙湾村土地掠夺到汉洲港的洗钱黑幕，从警队内鬼的暗中作祟到扫黑英雄的慷慨赴死，每一个情节都脱胎于真实的博弈。正是这种“贴着现实写英雄”的创作路径，让剧中人物形象格外生动、饱满。观众不仅能一窥案件的复杂全貌，更能触摸到真实的生活质感，感受扣人心弦的戏剧张力，进而产生对法治精神的深切认同。这一创作初心，让作品的思想表达实现了倍数放大。

当然，真实性若缺乏艺术转化，再厚重的现实素材也难以成为打动人心的影视作品。《罚罪2》的“破圈”密码，恰在于它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恰当平衡点。双时空叙事结构的运用——当下侦查线以1990年代回忆的交织，不仅增强了悬疑感，更揭示了罪恶的生成机制：黑恶势力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制度漏洞与人性弱点中滋生的社会毒瘤。这种叙事方式将法治置于历史长河中审视，让观众领悟到：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力手段，更需要从源头筑牢法治的堤坝。

这部剧艺术效果的实现，还体现在对人性之复杂的精准描摹。秦枫与刘天也，这也对异姓兄弟的命运撕扯，构成了全剧最戳心的人性样本。他们曾在龙湾村渔船上相依为命，却因不同的人生选择走向正邪殊途。秦枫的每一次抉择都在情法之间挣扎，刘天也的堕落也伴随着良知的回响。这恰恰印证了法治的精髓——法律惩罚的不是抽象之恶，而是具体的人在具体情境中的错误选择；法治守护的也不是真空中的正义，而是充满烟火气的人间秩序。剧中对“保护伞”彭含章的刻画，更是复刻了现实中职务犯罪者的伪装性与危害性，揭示了法治建设最艰巨的任务往往在于清除内部的腐败。

在算法主导、爽感至上的影视市场，《罚罪2》的成功印证了这一点：真正的爆款，源于对社会心理的精准回应。它没有依赖明星流量，也拒绝悬浮的“神探”人设，以扎实的细节、沉稳的叙事与深刻的现实关怀，提供了一种对“清明重现”的期盼。追剧观众在社交平台热烈的讨论，不仅体现出对曲折剧情的好奇，更折射出“有罪必罚，法大于天”这一法治内核的集体认同。这种情感共鸣，让剧集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属性，成为一部启迪人心的作品。

从现实案件的硝烟弥漫，到文学书页的墨香沉淀，再到荧屏光影的流转呈现，《罚罪2》的故事让我们倾听来自现实的回响，懂得安宁的生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法治工作者以热血与生命守护的结果。

“天就快亮了！”

这既是支撑剧中人在黑暗中前行的信念，更是屏幕外每个普通人发自内心的希望。当法治精神通过真实可信的文艺表达触及人心，它便不只存在于严肃的条文中，更化作人们心中一盏长明的灯、一束不灭的光。这或许就是《罚罪2》最深沉的启示——法治精神唯有转化为人民心中笃定的信仰，才能穿透黑暗的阴霾，照亮每一寸土地，温暖每一颗期盼正义的心。

红色法治文化的江西实践

上接第五版 借鉴苏区“座谈会”审判理念和贴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模式，在全省广泛推行“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健全以案普法和媒体公益普法长效机制，推动普法工作深度融入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

其二，全面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建设。秉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兼息事宁人之旨，持正道公平之法”的初心，遵循遂川县工农兵裁判部“定分止争”的思路，有效整合信访接待、多元化解、诉讼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等资源，建立健全综合施策的“预防在先、全面排查、调解优先、法治保障、闭环管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

其三，创新打造“红色文化+社会治理”工作品牌。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指导和推动各地积极培育“寻乌经验”“红色治理法”“红色物业”等工作品牌，将红色基因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实践，提升治理效能。

滔滔赣江水，殷殷红土情。江西正以系统性的实践，让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深度融合，使沉淀在历史中的法治故事、法治精神，在赣鄱大地真正亮起来、立起来、活起来，汇聚成当代法治建设的不竭源泉。

上接第五版

“‘小原说法’始终紧跟党节节气，围绕中心工作开展系列化输出。比如，在植树节宣讲公益诉讼守护绿水青山，在世界读书日分享经典诗行等。”何志斌介绍，每部作品都紧扣真实案例或检察核心职能，让普法工作有温度、有节奏，也让“检察蓝”的守护形象更加具体可感。

目前，中原区检察院自主设计的“检小原”便民服务智能一体机已在该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创作团队将AI数字人“检察官小原”融入其中，设置专属普法版块，滚动播放普法作品，同时为办事群众提供法律法规、相关案例的查询服务，实现普法与便民服务有机融合。

“没想到法治宣传作品这么美”“真的共鸣了”“期待下一部新的作品”……“小原说法”不仅得到了网友的好评，还为检察机关拓宽了法律监督线索来源。“我们已接到10余条有价值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中原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赵增辉说。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档案馆）



漫画/高岳

路温舒与西汉司法改革

——“尚德缓刑”思想的传承与回响

法史钩沉

□ 王云柳

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有云：“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披蒲编”这一典故的主角，正是西汉著名司法官路温舒。他以蒲草为纸、恒心为墨，挣脱寒门桎梏，深耕司法实践，秉笔直书《尚德缓刑书》，以“宽刑恤民”的法治理想推动汉代司法革新，为中华法治文明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寒门儒吏的司法初心

路温舒，字长君，西汉钜鹿郡东里（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东里村）人，历任郡决曹史、廷尉奏曹掾、临淮太守等职，是西汉知名司法官、法律学者，也是勤学励志的典范。他精通《春秋》，因在汉宣帝时上疏《尚德缓刑书》，被誉为汉代司法改革的先驱。

路温舒出身寒微，少年时以牧羊为生，却不甘困于蒙昧。彼时简牍珍贵，寻常人家无力购置，他便采集沼泽蒲草，截成竹牒模样编缀成册，借书抄录研读。这份“蒲牒写书”的苦读积累，为其日后深耕司法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根基，他的仕途进阶亦始终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连。

汉代自萧何制定《九章律》，律法体系日渐完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虽已推行，司法领域仍深受法家重刑思想影响。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擢用张汤、赵禹等酷吏修订律法，增设“见知故纵”“官吏连坐”等严苛条款，甚至恢复秦朝“诽谤”之刑，更以“腹诽”之罪诛杀直臣。重刑主义导致律法繁密冗杂，司法

实践中，则常有官吏舞文弄法、罗织成狱、同罪不同罚的现象。

尚德缓刑的司法革新

汉宣帝即位后，亟须革除弊政、安抚民心。路温舒目睹严刑峻法之祸，于公元前67年毅然上书《尚德缓刑书》。在酷吏余威未散的背景下，这份上书背后的胆识与魄力尤为可贵。

《那台大事记（古代-1978年）》明确记载：“汉宣帝地节三年，巨鹿人路温舒上书汉宣帝建议改革司法制度，减少冤狱。”该疏言辞痛切，深刻揭露当时的司法黑暗，被《汉书》《古文观止》及明清历代《顺德府志》收录，成为两千年中国司法史上的经典文献。

疏文开篇引齐桓公、晋文公乱世后行仁政成霸业，汉文帝废肉刑得民心的史实，提出“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的核心观点，为司法改革铺垫理论根基。继而直指要害：“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酷吏以严苛为“公正”，判案公允者反遭祸患，司法官吏更为自保竟刻薄的苦读积累，为其日后深耕司法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根基，他的仕途进阶亦始终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连。

汉代自萧何制定《九章律》，律法体系日渐完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虽已推行，司法领域仍深受法家重刑思想影响。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擢用张汤、赵禹等酷吏修订律法，增设“见知故纵”“官吏连坐”等严苛条款，甚至恢复秦朝“诽谤”之刑，更以“腹诽”之罪诛杀直臣。重刑主义导致律法繁密冗杂，司法

基于对弊政的深刻剖析，路温舒提出具体改革主张：“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亡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核心是废除钳制言论的“诽谤罪”，简化律法条文，放宽刑罚尺度，从制度上遏制酷吏横行。

这份疏文在朝野引发震动。汉宣帝深以为然，将其主张转化为司法实践，下诏在廷尉增设四员廷尉平，秩六百石，专职审理冤案，从机构设置上强化司法监督。此后每季秋后清狱，汉宣帝常亲临宣室殿斋戒决策，司法风气为之一变，“狱刑号为平矣”。

传统智慧的当代传承

尽管《尚德缓刑书》诞生于封建专制统治语境下，但其蕴含的尚德恤民、反对酷刑、追求司法公正的思想内核，却穿越千年时空，与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形成共鸣，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传统智慧借鉴。具体而言，这种价值共鸣与传承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德法共治”的创新转化。《尚德缓刑书》中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专任刑罚，主张“德主刑辅”。这一传统法治智慧与现代法治建设中“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一脉相承。道德与法治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构筑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支撑。一方面，道德为法治提供价值根基，应充分发挥道德的教化引领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持续强化对法治文化的支撑效能。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保障，将实践中社会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引导全社会筑牢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而宽严